

西方文字思潮 在现代中国的传播史

张大明 编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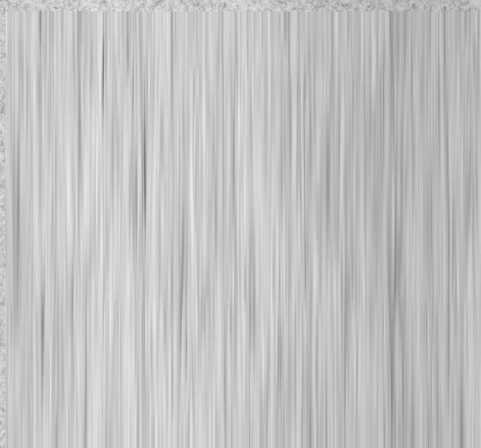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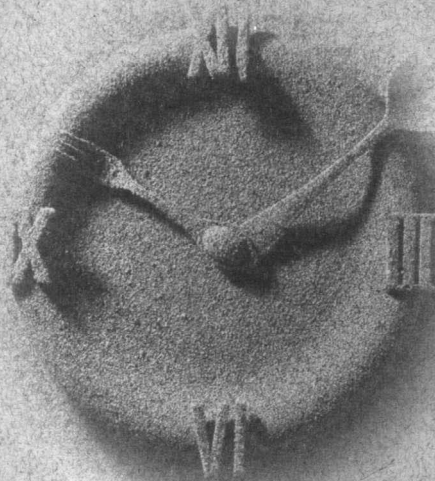
XIFANGWENXUESICHAOZAXIANDAI
ZHONGGUODECHUANBOSHI

四川教育出版社

I109.9
Z094

西方文学思潮 在现代中国的传播史

张大明 编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传播与碰撞: 西方文学思潮在现代中国的传播史/张大
明编著. —成都: 四川教育出版社, 1999

ISBN 7-5408-3412-9

I. 传... II. 张... III. ①文学史-中国-现代②
文艺思潮-研究-西方国家 IV. I209.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53216 号

责任编辑: 武 明

技术编辑: 王 凌

美术编辑: 何一兵

责任印制: 吴晓光

西方文学思潮在现代中国的传播史

张大明 编著

四川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成都市盐道街 3 号 邮政编码: 610012)

七二三四工厂印刷

(地址: 成都市红星中路一段 35^号 邮政编码: 610017)

2001 年 1 月第一版 2001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 880×1230 1/32 印张 27 字数 630 千

印数: 1-1,000 册

ISBN7-5408-3412-9/G·3217 定价: 58.00 元

* * *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调换, 电话: (028) 6917673

自序

实实在在地做人，踏踏实实地工作，认真真地做学问，这是我终生不变的信条。

为此，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是一本怎样写的书，首先要向读者交代清楚，才使想买这本书的人不上当，已经买了的不后悔。

坦白说，本书没有多少理论，只有史料。丰富的史料，扎实的史料，准确的史料，有系统的史料。它是经过鉴别和选择的史料，是有序的史料：一堆史料。搞研

究工作，究竟是史料重要，还是理论重要，是史料积累容易，还是理论修养容易，提出这个问题，就显得滑稽而可笑，显得浅薄无知，但确确实实人们对此是有争议的，或者说是有偏向的，是有人各执一端的。正确说，二者都重要，哪一面都不能偏废。必须二者结合，而且要紧密地结合。所谓有论有据，指的就是这二者的结合。而能够二者紧密结合者，偏偏又不是人人都做得到的。像我，就不敢说有深厚的理论修养，只能说在史料的积累上，我是下了苦功夫的，这书中的任何一条史料都是我心血的结晶。史料搜集靠勤奋，理论修养还要有天赋。我不是那种天资聪慧的人，只有多做笨事蠢事傻事。

2 本书是我们的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研究课题的副产品。由马良春、李葆琰和我进行的现代文学思潮研究课题，酝酿于1978年，1980年正式上马，1986年确定为国家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同时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重点项目，1995年底出版《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史》（此书写作时，外聘陈学超教授参与执笔部分章节），工程结项。这个课题原拟出书三种：一是100万字的思潮史，二是50万字的现代文学思潮流派大事编年，三是250万字的思潮流派资料

汇编。第一项已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第二项由李葆琰和刘平负责，已有半成品；第三项已有符合出版社齐清定要求的书稿。经过三四年来的种种努力，看来在短时间内第三项尚无单独出版的可能。

为了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思潮流派，前人没有积累这种单项资料，只有靠我们去图书馆一篇一篇地查找，一字一字地抄写。其资料搜集，主要是由我和刘福春、刘孟军三人共同完成的。我们一共搜集到手的资料大约有 500 万字的样子。我们要感谢北京图书馆、首都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图书资料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图书资料室、上海图书馆、上海作家协会图书资料室、复旦大学图书馆、上海辞书出版社图书资料室、杭州大学图书馆、四川省图书馆、四川大学图书馆、重庆图书馆、重庆北碚图书馆、西南师范大学图书馆、重庆师范学院图书馆、中山大学图书馆、吉林大学图书馆等等单位给予我们的方便和协助；当然首先要感谢本所图书资料室的大力帮助。搜集资料之苦，我只举一个侧面的例子，以窥全豹。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我们国家刚有复印机，但

不是每个单位都有。像北京图书馆，有一两台复印机，但听说油墨和复印纸都要靠从日本配额进口。因此，每天每人就限定只能印6张纸的材料；还必须每天很早很早就去排队等候，稍晚一点，就请明日再来了。于是，在柏林寺藏书楼借出杂志（多亏那时候他们的服务态度比现在好得多），一本一本地查找，找到有用的文章，夹上纸条，办好复印手续，第二天再到北图本馆去排队等候，再填单子办手续；有时还不能当时就取，要等上几小时，或者第二天去取；若遇一篇较长的文章，必须重复跑两天甚至三天，才能印完。要到北大去查找资料，比在北图还要烦难许许多多。这就不说了。我们也要感谢一些外单位，尤其是外地的朋友帮忙查找资料，比如上图徐家汇藏书楼的张伟兄，就帮我们查了许多资料，并由他去买纸，请人抄写，他本人负责校对，再跑邮局寄发，领汇款单，与人结帐。这都是无私的。多可贵的情谊啊！再如北大的唐沅教授、四川大学的陈厚诚教授，原在西南师范大学读书、后到云南教书的官晋东先生等，都为我们查找或亲自抄写过资料，这里一并表示感谢。

像本书这样写，也算史吗？像史吗？不

知道别人怎么看，反正我认为它是史。我这里所讲的新浪漫主义、象征主义、唯美主义、左翼文学思潮、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20世纪现代主义，每一种思潮在中国的传播过程，它的来龙去脉，即第一个是由谁引进的，继之是如何进行的，引进了些什么，中国文坛是怎样理解的，它在中国的命运如何，产生何等影响，等等，这一历史进程，本书都依过硬的史料讲得清清楚楚。书中的每一句话都是史料，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不要花枪，不投机取巧，把线索理清楚，把轮廓说明白，把重点突出来，把要害点一点。这还不是史吗？我自然也有自己的看法，这看法，就隐藏在我的取舍上，我的排列上，偶尔也表现在我的评价中。不凭史料，就思如天马行空，文如行云流水，滔滔不绝，说得天花乱坠，搅得天昏地暗，固然令人佩服作者的才气和勇气，但我没有那等本事。我也深深地知道，如果我有深厚的理论修养，有锐敏的感觉，有最新的国内外学术发展的信息，会使本书既有坚实的史料基础，又不乏理论阐释，烛照探幽，把经验教训说得更明白些，把规律讲得更充分些、更透彻些，并由个别上升到一般，由现象上升到理论，为今人

指点迷津，岂不更好！但我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我知道我能吃几碗饭，我只能老实一些。不但老老实实在地编排史料，还老实实在向读者坦言我的笨拙。

本书的史料是由我和刘福春、刘孟军共同搜集的，三人合写最好。但福春的兴趣在诗歌研究，尤其是新诗资料的搜集整理（在这方面，他是全国无可争辩的权威）；孟军小姐远在美国深造，不能参加。后决定由我和葆琰协作。但当写成200~250万字的规模的大纲初稿出来后，葆琰决定另写专著，一身难得两兼，不得已，只能由我一人来完成。这样规模就小了很多，把诸如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自然主义以及与中国现代文学有密切关系的几种哲学思潮和社会思潮，等等，通通舍弃，只拣几种相对说来资料难找的思潮来写，于是成了现在这个样子。他们三人虽然没有参加，但我在写作过程中，还是时时与他们商量，向他们请教，好主意就是他们出的。要写这本书，向社会公布一点我们所掌握的史料这个点子，就是福春想出来的。我身体曾一度被累垮，想打退堂鼓，不写了；又是他们始终鼓励我进行下去。这信心，这勇气，是他们给我的。我们几人之间的友谊是任何物质的

东西换不来的。我还直接或间接地得到现代文学研究室诸多同事的指点。

每一种文学思潮，我基本上是严格按照传播与碰撞的时间顺序来写的。这样写的好处是可以明显地看出“五四”时期、20年代、30年代、抗战之后，各时期各阶段，由于主宰文坛的思想有变化，因而对外来思潮的认识、态度、取舍就相应地有变化。但在某些方面也有缺点。比如一个波特莱尔，就分几处介绍，不集中，不突出，还难免有某种不可避免的重复。拿象征主义思潮来说，如果按总体面貌——波特莱尔——他同时代的马拉美、兰波、魏尔伦、魏尔哈伦、梅特林克等——后期象征主义——中国的象征主义创作这样的顺序来讲，也许脉络要清晰得多，但却很难看出各时期各阶段认识、取舍的变化，史的线索就不免要弱一些暗一些。对于这些思潮流派在50年代以后，尤其是在又一个世纪末到来的时候在中国的传播情况，由于我缺乏这方面的全方位的知识，且到八九十年代，随着又一次思想解放的到来，中国文坛十分活跃，各种思潮耀眼，流派纵横，仅凭一人一时之力，也难以理出头绪。因此，我这搞现代文学研究的人，就“忠于职守”，恪守本分，不僭越，即便

偶一跑题，也是点到为止。

为了忠于历史、忠于读者，我在写法上，尽可能地多引用史料，并尽可能地保留史料的原生状态。对于不太长的精彩论述，我加引号直接引用；而为了行文的流畅，语气的衔接，对于一般论述，我就拣其要者（取其精华），加以组合，间接转述、综述。这综述部分，也许是不加引号的原文，也许已经含有我的看法。还为了力避行文啰唆，在多数情况下，一般不加“现将作者的论点综述如下”之类的字句。但我将尽量分清楚哪是作者的原意，哪是我的叙述和议论。这是由本书的内容所派生出来的写法上的特点。

几十年中，对外国作家作品的译名很不统一。我在本书中，除在一定的地方对那些奇奇怪怪的译法加以综合罗列外，如果是引文或近似于引文的述说，悉用原作中的译名，但加括号注明现今通译；而在我的叙述中，则用现今的通译。这通译的根据就是《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的译名，或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编的三卷本《外国名作家传》（茅盾题写书名）的译名，也参考过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1月出版、计1908页的《世界文学家大辞典》。

为了对读者(尤其是其中的研究者)负责,我所引用的每一条史料都详细地注了出处。我用的材料,不是从原始报刊上查找的,就是从初版本书上摘抄的。我几乎没有用第二手资料。原文中的错别字,我也照样输入(太明显的,就加括号、问号提示);原文中的外文,也悉数保留。但那些外文(多为英文和法文),我就只能凭借收单词和词组 18 万余个、厚 1769 页的《大英汉词典》加部分注释,还不知对不对,也不知闹了多少笑话。

我要感谢四川教育出版社为我出版这样枯燥的书,不赚钱的书。文甫副社长、武明同志,为此付出了不少心血。

再次感谢从各方面关心我、支持我、帮助我的朋友!

1998 年 7 月 20 日

引言

中国现代文学是一个开放的体系，是一个进步的革命的过程。

挣脱了闭关锁国观念的束缚，卸下了祖先一切都好的精神负担，改变了瞒和骗的历史循环，睁眼看世界，努力接触新事物，敢于拿来，勇于吸收，善于消化，勤于创造，这就使现代文学始终保持生机勃勃的态势。中华文学曾经光辉灿烂过，但到近代却停滞了，落后了。停滞，要腐败发臭；落后，要挨打亡国。只有奋起直追，迎头赶上，才有前途，才有希望。几

代有志之士筚路蓝缕，披荆斩棘，学习西洋，介绍西洋，以健全的胃吃下西方几百年间的思潮流派、学术文学、名家名著。开始是全盘接受，慢慢地学会了选择。在接受中碰撞，在碰撞中选择，在选择中试验，在试验中发展，在发展中创造。

可以说，中国文学发展到近代，虽说比西方落后了一二百年，但在几年间，就把西方那一二百年间的思潮流派摸索了一遍，大体不差地介绍了一通，也试验了一阵。

中国近代文学落后，但不是什么时候都落后，更不是在所有方面都落后；落后，仅仅是在与近代西方的比较之中显示出来的。比较，是良药，是清醒剂。

有几篇文章，是从比较之中，从总体上，从全局上，来谈中国现代文学和西洋文学的关系的。它们各有侧重，都说到部分真理。比如：

罗家伦的《近代中国文学思想之变迁》，载 1920 年 9 月 1 日《新潮》第 2 卷第 5 号。本文洋洋洒洒近二万字。主要讲时代和环境对文学的影响，或说文学对时代和环境的依赖关系；

华汉（阳翰笙）的《文艺思潮的社会背景》，载 1928 年 4 月 1 日《流沙》半月刊

第2期。作者用刚刚习得的一点马克思主义理论常识，生硬地讲西方的文学思潮与社会，特别是与阶级的关系，用以证明无产阶级文艺的兴起有其历史的必然性；

鲁迅的《上海文艺之一瞥》，1931年7月20日在社会科学研究会的讲演，记录稿载1931年7月27日、8月3日《文艺新闻》第20、21期，经作者修改后，收入《二心集》。讲晚清到民国初年一直到当前上海文艺的变迁，以及这种变迁与社会、人心和外国文学思潮的关系；

王平陵的《中国文艺思潮的没落与复兴》，载1932年12月5日《矛盾月刊》第3、4期合刊。作者站在民族主义文艺家的立场，谈“五四”至30年代初文学思潮的变迁。颇多偏见，但也算一家之言；

胡兰成的《五四以来中国文艺思潮》，载1942年9月《上海艺术月刊》第9期。本文主要讲政治与文艺的关系，围绕鲁迅讲文坛现象，其见不免偏颇；

卞之琳的《新文学与西洋文学》，载1945年8月《世界文艺季刊》创刊号。讲继承传统和借鉴外国的关系：继承传统是自发的、从血脉里流出来的。借鉴外国是自觉的主动的；

朱光潜的《现代中国文学》，载1948

年1月《文学杂志》第2卷第8期。本文讲近代50年中国文学的变迁，这变迁的渊源以及在创作上的表现。

这些文章都从全局着眼，从全文坛着眼，各有各的价值。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 近代到“五四”

罗家伦，北京大学学生，胡适的高足，新潮社骨干，“五四”文学革命的闯将之一。他的《近代中国文学思想之变迁》，末署“九年十月三日，完于太平洋舟中”，即于1920年10月3日完成于留美途中，载1920年9月1日《新潮》第2卷第5号（足见本期刊物未能按期出版）。

4

以下是罗文论点荟萃：

他认为，讲学术，要注重空间与时间这两个观念。“空间则注重环境的情形”，“时间则注重演化的程叙（序）”，一句话，要注重“此时此地”。【按：本文一些重要字句，都加了着重号，而且不仅是圆圈，还在圈内加黑点。为着减少输入排版的困难，本书所引，一律未加这些符号。】这是因为“近代思想受了科学洗礼的缘故，无论哪种学说，断不能离开一

切，悬空立论。”不但观念要科学，就是方法也要科学。近代以来，就思想方法而言，先有培根派的“归纳法”，以“唤起人类对于空间的观念”；次是达尔文派的“历史法”，注重演化程序，“特别唤起人类对于时间的观念”；现代的“科学方法”则兼收众长，确当精密，“一方面可以谋环境的适应，一方面可以免时代的错误；所以不但能应用到科学上去，而且能应用到思想上去”。

而中国人正是害了不管环境与时间的两大病症：

(一)不问环境的情形，以求适应；

(二)不知时代的错误，以求进化。

罗家伦认为，文学思想“最足以代表时代的精神”。因为文学思想决不是无缘无故生出来的，必定有一种人类的生活为其背景。本文以下的立论，就是“先把当时政治社会的背景写出来，而后列举文学思想的本来性质”。

他说，中国近代时势的变迁，约分四个时代；所以文学思想的变迁，也分为四个时代。每个时代文学思想的变迁，正符合某个时代政治社会的背景。